

2011 年

“公共焦虑”催生社会管理新思路

2011 年，雾霾天气击中民众的“污染焦虑”；食品行业的新国标制订引起人们“食品安全焦虑”；“郭美美”事件引发“公益焦虑”；“限堵令”与“出行难”带来“拥堵焦虑”……

这些纠结与争议的背后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——“公共焦虑”。种种焦虑背后，是广大公众对公共事务决策更加科学、民主和透明的强烈期盼，发出的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亟须向深层次迈进的强烈信号。

“公共焦虑”频发 折射社会管理之痛

仅仅几天，“PM2.5”这个环保领域的专业术语变得人尽皆知。“雾天不等于污染天”，北京空气质量“现在与以前比有进步”——有关部门的回应，在网上引来广泛讨论。同样的大雾天，有人看重宏观数据统计，有人突出微观污染感受。民众“焦虑”的背后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有效沟通，才能得到普遍认同？

在诸多知名品牌速冻水饺陷落“金黄色葡萄球菌门”后，新版速冻面米制品国标中将这一项目从“不得检出”改成“限量检出”；生乳新国标中，蛋白质含量变为下降，每毫升中菌落总数标准提升……关乎消费者健康安全的新国标，到底是“进步”还是“开倒车”，谁来化

解公众的食品“标准焦虑”？

因为“郭美美”事件的影响，公众对部分慈善机构、公益性事业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强。连日来，多个省市的血液储备纷纷告急。献血率走低背后，大众“担心血液被牟利”的看法占据相当比例。

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中城市，纷纷出台各种“限车令”的同时，出行难问题没有根本改善，在拥堵的道路和拥挤的公交间，大家每天都要做“艰难的决定”……

密集出现的“焦虑”牵涉诸多领域，引发争议之强、对政府部门公共决策的冲击力度之大，是空前的。“可以说，整个社会都在不同层面上感受到了‘公共焦虑’之痛。”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郭巍青说，这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“阵痛”，这是发展必须要跨过的障碍。

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认为：“‘公共焦虑’的蔓延，表明作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。最直接的后果，就是公共决策环境恶化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社会管理能力被不断削弱，最终政府公信力和公众权益也会受到损害。”

“公共责任”意识增强 提升“公共决策”期待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人们对慈善、环保、食品安全等

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大幅提高。这既是“公共责任”意识的增强，也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“助推器”。

专家分析认为，转型期的社会中，群众权利意识增强，也变得更具“敏感”，会用比过去更高的标准去衡量干部和政府。而表达渠道增多，舆论场域变化，也容易让某些诉求迅速“发酵”。这些资源用好了，公共治理工作的正面效应会倍增；而处理不好，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小视。

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表示：“‘公共焦虑’的特点，是责任主体的多元化，相关事务不仅依赖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决策与管理、服务，也要求每个参与其中的公众个人发挥作用。”

“天气一变差，有关部门就被指责得一塌糊涂，说报的指标是骗人的。”北京一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无奈地说，“城市的污染排放这么大，为何不想想，我们每辆车、每个人也可能是污染的‘贡献者’呢？”

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我国公共事件信息“供给”不足，而百姓的“诉求”却在与日俱增。这使得当前的公共治理工作，有一个“开放的边界”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，寻找与群众交流沟通的共同语言，这些，是深刻变化的时代对公

共治理工作提出的全新要求。

部分领域公共决策的不广泛，成为“公共焦虑”的主要原因。曾业松说：“公共决策的核心在于公众参与，不能让公众在决策过程中有‘被代表’的感觉。决策的参与面小，就会导致公众对决策结果不买账、不认可。”

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，也容易引发“公共焦虑”。回顾今年一些热点事件，可以看到一些政府部门和相关公共机构，决策程序仍是“信息单项发布”，对公众的疑虑和意见缺乏反馈机制。“在以乳业标准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制定过程中，就反复有声音认为公众参与是‘走过场’。”郭巍青说。

公共决策的不尽科学，直接刺激了焦虑的发生。曾业松认为，微博、新媒体的飞速发展，让公众有了更多更主动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，但有些机构、官员仍习惯于“捂”“瞒”的应对策略，导致公共决策机制陷入被动。

深化社会管理创新 给“公共焦虑”安上“减压阀”

“公共焦虑”的产生，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密不可分，考验的是公共决策能力。

郭巍青说：“在社会管理中，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，树立社会参与、共同治理的理念。只有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、自律、互律作用，才能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合力。”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公共焦虑”之痛已经在促使一些领域产生新的

公共治理思路。

面对纷繁复杂的公众利益诉求，2011 年，我国各地涌现出数万个“官号”的政务微博群体，受到公众关注，能够及时回应热点和社会关切，探索建立放手让公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模式，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成为共识。

以深圳为例，这座城市在举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，没有采取强制性限行，而是鼓励市民“自愿申报停驶”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放手赋予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公共治理思路，赢得了民心民意，短短十多天里，全市主动申报停驶的机动车逾 43 万辆，为一座城市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“社会管理，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。只有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决策过程中，他们才能增强对公共决策结果的信任感，切实认识到自己的权益和责任，既维护应有的公共利益，也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才能真正打消因公共资源、公共空间使用和分配不合理导致的‘公共焦虑’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元竹说。

化解焦虑，还应当探索推进新的公共信息交流模式。专家认为，在公共事务领域，政府部门应将信息发布模式从以往自上而下的“决定—宣布”模式，转化为多渠道、多层次的“反馈—协商”模式。只有畅通公共信息通道，加强公众“社会心态”建设，才是“公共焦虑”最有效的“减压阀”。

(据新华社电)

淮阳“萝卜哥”欲把菜免费送给低保户 可运输犯了难，谁能帮他实现美好心愿？

(上接 A01 版)前几天有批发商愿意以每公斤 0.1 元的价格收购他的萝卜、白菜，被他拒绝了。“5 分钱一斤太伤人了，1 万斤才卖 500 元”，而这仅勉强够他将菜从地里搬运到车上的人工成本。

王鹏飞说，为了了解市场行情，他订有报刊，还经常上网。这几年一直在家种菜，去年萝卜、白菜行情好，今年他们村家家户户都种，结果造成丰产滞销局面，很多菜农血本无归。在他看来，出现这种局面还是因为菜农对市场信息了解不充分。此外，配套设施不

完备也是白菜贱卖的原因之一，“普通菜农根本没有大量储藏的实力”。王鹏飞心痛地说，天气马上会更冷，与其眼睁睁看着白菜被冻烂在地里，还不如免费送给低保户。

因为农村不缺这些，送都送不出，王鹏飞执意要让自己的菜进城，他知道城里的低保户没地种菜，过年不掏钱买就没菜吃。王鹏飞说：“我想送给城里的低保户、敬老院 1 万斤萝卜和 1 万斤白菜，反正家家户户冬天都离不了，算是礼轻情义重吧。剩下的菜

我慢慢卖！”

这一想法确定后，王鹏飞很快就为怎么将这 1 万公斤菜运到城里犯了难。按说做好事就要做到底，但王鹏飞说他今年种菜已经赔进去了不少钱，要把这 1 万公斤菜运过去，光运费也要不少钱，几乎血本无归的王鹏飞已有心无力，只有求助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。

一枝一叶总关情，萝卜白菜也有爱。记者期待有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13592220025 爱心参与，共同完成一个普通菜农的这一美好心愿。



12 月 21 日，广州市黄埔大道进城方向拥堵的情形。上班进城堵下班出城堵是不少城市的通病。

一则“萝卜帖” 社会各界西华争买爱心菜

(上接 A01 版)但由于产量过大、采收期相对集中、运输成本和市场不畅等原因，西华县的萝卜、白菜等大宗蔬菜出现不同程度的滞销，乡亲父老辛苦一季、浸透汗水、费尽心血种植的水灵灵、脆生生的大白萝卜，面临砸在手里、烂在地里的困难窘境。”

帖子一经发出，立即引起了周口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他们纷纷向西华菜农伸出友爱之手，帮助他们解燃眉之急。

帖子发出的当日，西华县华龙农贸市场总经理尚建华连夜召集相关商户开协调会议，制定了帮扶菜农销售萝卜、白菜的具体措施，赶印

了“吃爱心萝卜 帮帮农民兄弟”的宣传单 1 万余份，向过往司机、学校、企业、建筑工地发放，大量收购菜农的萝卜和白菜，以每公斤 0.2 元的价格供应市民，并规定：“所有在华龙农贸市场交易的萝卜、白菜免费过磅、免费交易、免费供应茶水”。据市场管理人员说：截至 12 月 21 日上午，每天进入市场交易的萝卜达 200 吨左右，他们尽其所能每天也只能处理 120 吨，“看着菜农手里的东西卖不出去，我们也很痛心。”尚建华说。

12 月 21 日，西华县政协经济一组的齐育才、宋应超等委员得知消息后，立即组织全小组人员向菜农伸出

援手，他们自费购买菜农的萝卜、白菜 0.8 万公斤，免费送给西华县箕城高中、金鑫车业等学校和工地，并表示“只要菜农们的萝卜、白菜销售没有走出困境，我们就会联系更多的人和企业，帮助菜农销售”。

当日上午，周口市政协领导从中华龙都网上得知西华滞销萝卜、白菜的消息后，组织全体人员集资集体购买萝卜 0.5 万多公斤，并呼吁社会各界向西华菜农伸出援手，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西华县富美混凝土公司、河南宋河酒业、伊利奶业驻西华办事处也引继前往购买菜农的萝卜和白菜，向菜农奉献爱心一片。

广告